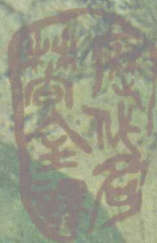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新書全譯

[漢] 賈誼 原著 李爾鋼 譯注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汉〕贾 谊 原著

李尔钢 译注

新
书
全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袁华忠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闵 英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新 书 全 译

[汉]贾 谊 著 李尔钢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38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221-04573-9/K·428 定价:22.50 元

前 言

贾谊是西汉著名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只活了三十三岁，就像一颗流星，在太空中一闪即逝。但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参预了文帝朝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留下了以《新书》为主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他那用短暂的生命燃烧出来的灿烂的思想之光，不仅照亮了有汉一代政治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谊其人

公元前 200 年（汉高帝七年），贾谊出生在河南洛阳。这一年，创建汉朝的汉高帝刘邦正忙于征讨勾结匈奴反叛的异姓诸侯王韩王信，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七天，几乎死在那里。以后，刘邦逐步把贯高、陈稀、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异姓诸侯王和骄兵悍将一一消灭，封了一批皇室子弟亲属同姓诸侯王，对匈奴和亲，休养生息，汉朝获得了急需的巩固机会。

公元前 183 年，贾谊十八岁，以能诵读诗书名闻乡里。河南郡守吴公，把他召到门下。吴公曾是秦朝丞相李斯的学生，从李斯那里学习过从老师祖荀况那里传下来的学问。贾谊在吴公门下学习三年，到公元前 180 年，又向当时的著名学者、荀况的学生张苍学习《左传》。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政变。

执掌汉朝国柄多年的吕太后死了，周勃、陈平乘机扫灭执政诸吕，迎立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贾谊的老师淮南王丞相张苍拥立有功，升任朝廷副丞相御史大夫。第二年，十分赏识贾谊的河南郡守吴公入朝任廷尉，由于吴公的推荐，文帝任贾谊为博士，贾谊进入了汉朝政治中心，这一年，贾谊二十二岁。

作为朝廷最年轻的博士，贾谊表现得非常突出，每逢有诏令或者讨论，各位先先生还未及开口，贾谊已经作出了系统详尽的答对，说出的意见，全是大家想说却不知该怎么说的话，大家都夸他能力强，文帝也对他十分赏识，越级加以提拔，一年之中，升为太中大夫。贾谊对于皇帝的赏识自然感激不已，于是全力以赴，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提出，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未实现由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拥戴汉文帝即皇帝位的大臣权力过重，政治延袭秦朝遗制，过于严苛。在他作于这一时期的名著《过秦论》之中，他借批评亡秦，指出时弊，要求因时变、革时弊、行仁政。他推动修改法令；提出居住在长安的列侯都各自回其封地以削弱大臣权力；认为应当改变服色制度官名年历，兴礼乐，并起草各项礼仪法律和变更办法上报皇帝，受到文帝高度重视。汉文帝认为贾谊应当担任首相、大臣一类更重要的职务以推进这些改革，但由此却引起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老一辈功臣们的强烈反对，指责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大臣们的反对来得如此意外强烈，使刚依靠大臣们的拥戴登上御座的皇帝感到了自己政治基础的震动和摇晃，于是汉文帝立刻作出了现实的政治抉择：搁置各项改制议案，疏远贾谊并放逐他，派他出任长沙王太傅。这时是公元前177年，贾谊二十四岁。

当时长沙王吴差，是全国仅存的一个异姓诸侯王，封地荒僻，人民仅二万五千户。贾谊从首都长安一下子被贬到千里之外的蛮荒小国，其郁郁沉重而无可奈何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一时期他的名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反映了这种心情。但是，

他并未就此消沉，在此期间，他对由周勃被冤下狱所引发的礼遇大臣问题和由文帝开放民间铸钱禁令所引发的采铜铸钱问题都给文帝上疏提出意见（即《新书》中之《阶级》、《铜布》、《铸钱》等篇），部分为文帝所采用。公元前173年受汉文帝征召，贾谊离开长沙回到长安，这一年，贾谊二十八岁。

贾谊受召进宫之时，皇帝刚刚祭祀完毕，坐在未央宫前正室（即宣室）享用祀天地的祭肉。庄严的祭典使皇帝的思路萦绕着许多有关鬼神的问题，于是谈话由文帝关于鬼神本质的提问开始，贾谊作了系统的回答，贾谊所讲的道理必定非常精彩，他一直讲到深夜，汉文帝并未感觉疲倦，反而不自觉地一再靠近贾谊，谈话之后，文帝深有感触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于是下令任贾谊为梁怀王太傅。关于这次谈话，唐代政治阅历颇丰富的诗人李商隐不以为然，曾写过一首诗加以讥讽：“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其实，李商隐错了。他不知文帝为求长生而问鬼求神是在公元前165年冒出个望气的新垣平之后，而那时贾谊已经死了至少两年，是宣室夜谈之后七八年的事。李商隐还不懂得汉代求长生不死和祭天地鬼神是两码事，求长生不死在于求不死之药，寻得道之仙，是找王乔、赤松子一类的归宿，成功之后即如后来汉武帝所希望的，弃妻子而乘龙升天；而祭天地鬼神却是为政权寻求保障，因为皇帝在名义上是天子，是所祭祀的先帝祖考的正嫡继承人。李商隐更不懂谈天地鬼神对于贾谊来说其实就是谈治国、谈苍生，因为无论问者汉文帝是否有求长生不死的本意，而在贾谊看来，天道、鬼神和人事其实是统一的。“信道则死，障光则晦，诬神而逆人则天必败其事”（《新书·耳痹》）。在这方面，贾谊的看法实为后来董仲舒天人合一论之滥觞。

梁怀王刘揖是汉文帝最小的儿子，喜爱诗书，汉文帝特别喜欢他。派贾谊做梁怀王的太傅，表明了汉文帝对贾谊信任的恢

复；而在这段时期，汉文帝实实在在向贾谊“数问以得失”，贾谊也不断上疏议论政事，写下了《宗首》、《数宁》等后来被称为《治安策》或《陈政事疏》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贾谊与文帝这一系列由宣室夜谈开始的对话本来还会继续下去，贾谊还会用他那才华横溢的笔更充分地发挥天才的思想，但意外却发生了。公元前169年，即贾谊担任梁怀王太傅的第四年，梁怀王刘揖入朝时不慎坠马摔死。贾谊自责失职没有辅佐好刘揖，经常哭泣，过了一年多，公元前168年，年仅三十三岁的贾谊去世了。

《新书》的思想内容

《新书》原有文章五十八篇，其中注明属事势类的二十八篇，属连语类的十七篇，属杂事类的四篇，《问孝》和《礼容语上》今佚，余五十六篇，着重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礼治思想

贾谊从秦朝灭亡的事实中，认识到秦朝片面强调法制，抛弃礼制，导致世风败坏。“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鞭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淬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新书·时变》）。法制的“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使“亲亲尊尊之恩绝”。这种现象，贾谊认为对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不利。“今至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改容而礼也，古天子所谓伯父、伯舅也，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伐、弃市之法，然则堂下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新书·阶级》）。

贾谊认为汉初存在的世风败坏，侈靡淫逸，崇尚诈力，违背礼义的民风是直接承袭了秦朝的恶俗；而统治阶级中存在的诸侯王僭越之风，也与礼制不立有关。

从这种认识出发，贾谊大声疾呼，要求恢复礼制，他指出：“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撝节、退让以明礼”（《新书·礼》）。从以上认识出发，贾谊所提倡的礼制，又以以下三个方面为重点：

1. 改变民风民俗。《时变》、《俗激》等篇中，贾谊历数当时民风败坏的诸种表现之后指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不循则坏。”在《孽产子》中，贾谊在抨击侈靡世风之后写道：“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叹息者此也。”要求采取积极措施，亲亲尊尊，建立礼制，改变民俗。

2. 制止诸侯王的僭越行为。这方面的文章，有《等齐》、《服疑》等篇，列举一系列尊卑不分，诸侯僭越的表现，提出要建立等级分明的制度，并用名号、旗章、符瑞、秩禄、服饰、车马、妻妾、宫室、用具、待遇等以示区别。“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于是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

3. 礼遇臣下，以养臣节。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阶级》篇。指出大臣有过错，可以斥退，可以罢免，可以赐死，但不宜侮辱和用刑。对于臣下“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

者，即非人类也。”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贾谊礼制思想的核心是“明等级”，“亲亲而尊尊”，而这对于巩固封建政权，纠正秦末严刑峻法的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贾谊并不否定法的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见《大戴礼记·礼察》，该文当为《新书》之佚文），在贾谊看来，法的作用，是礼的补充。

二、民本与仁政

贾谊从历代王朝特别是秦朝的兴亡过程中看到了人民对于政权的巨大作用。威势赫赫的皇朝，拥有无上权威，拥有锐不可当的军队，拥有环山带河的地势，“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过秦上》），这是何等令人惊心动魄的教训！贾谊正确地总结了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秦始皇“焚文书而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穷困，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过秦中》）。这就把统治者摆到人民的敌对位置。贾谊将历代王朝的灭亡与秦朝的灭亡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了结论，他写道：“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

这种认识，无疑具有时代的先进意义。在先秦儒家那里，即使喊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口号的民本主义者孟子，在谈到施政时，也只是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巨室”的含意，充其量不过是豪门大族，有威望的贤卿大夫而已。而贾谊的认识则进一步，他说：“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大政上》）。贾谊认识到，再也没有比人民人数更多、力量更大的“巨室”、“大族”了，统治者生死存亡，最终决定的因素都在人民心中。“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

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大政上》）。贾谊从历朝的兴亡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大政上》）。这是他得出的结论。

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这“万世之本”的人民呢？贾谊于是从君主统治者的角度，提出了“仁政”思想。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爱民利民。贾谊指出：“故君子之贵也，与民以福，故士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与民以财，故士民乐之。”“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大政上》）。他借用古代圣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提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修政语上》）。他在许多篇章中描绘出他心目中的仁君圣王的形象，有用粟米向人民换秕谷来喂鸟以富民的邹穆公，有“使百姓富，民恒一”的楚庄王，有因自己感到寒冷就打开库房拿寒衣粮食赈济贫民的楚昭王，有把百姓的饥寒疾苦时刻挂在心上的帝尧，他们由于爱民利民，人民也拥戴他们，并在他们遇到灾难时给他们以援助。作为对立面，那糟践人民的桀、纣，虽身为君王，却遭人民唾弃而死去的故事，也是贾谊在文章中经常讲起的。

2. 约法慎刑。贾谊多次指出秦王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过秦》）。“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保傅》）。因而提出应该“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约法省刑”（《过秦》），应该“狱疑则从去”（《连语》），“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疑罪从去，仁也”（《大

政上》)。他甚至把神圣的上苍也搬出来加重其论点的份量，指出：“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于皇天”（《耳痹》）。作为佐证，他在许多文章中描写了拆除三面网禁以给人生路的商汤；吃凉菜发现蚂蟥，因不忍让厨子和监食者被杀而吞下的楚惠王；听从陶朱公劝说疑狱从去的梁王，以及他们各自获得的善报。与之相对应，贾谊也叙述了好刑杀的秦二世；“剖伛者之背，斫朝涉之胫”的宋康王；以及擅杀无辜的楚平王；“怀贼行虐，深报而殃不辜”的伍子胥等的一连串的恶报（《春秋》、《耳痹》）。

3. 以民为行政选吏之程。既然以民为本，行政就要看是否与民有利。“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大政下》），所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政是要官吏去实施的，所以贾谊特别强调选吏。在这一问题上，贾谊提出了具有非常进步意义的民意标准。他指出：“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之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这当然还不是现代民主，因为人民归往拥戴之后，还必须得到“明君”的首肯；但是把人民在选择领导人过程中的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作为“吏之程”来看待的，贾谊是自古以来第一人。贾谊想通过人民选吏的办法，选出人民拥戴的官员，再由这些官员，实现他理想中的“仁政”。

三、重农主义

重农其实是民本思想的一部分，因为在贾谊看来，以民为本必须富民，而富民则必须重农。汉朝建立之后，经过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而被称为末业的工商业发展格外迅速。

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是使大批劳动力脱离土地转业，而富有的商人利用财产优势兼并土地、穷奢极欲，造成了侈靡世风和僭越礼制的现象发生。贾谊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侈靡之风流行，造成了“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孽产子》）的局面，动摇了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王朝的根基，使国家空虚，人民贫困，因而必须扭转。

贾谊所提出的根本措施是抑末强本。在《瑰玮》、《孽产子》等篇中，他历数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危害，指出“挟巧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文绣织作造成了“天下寒而衣服不足”，造成了僭越奢侈，因而应该“驱民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

贾谊从国家安危的高度看待人民蓄积的粮食，在《忧民》、《无蓄》等篇中，贾谊强调“苟粟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他忧虑国家和人民粮食蓄藏的危急情况，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弃本务末、浪费和侈靡之风。“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崇也。”而这，正是贾谊提出抑末强本，使“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的基点之一。贾谊的这种主张及其思考依据，主宰了我国后来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贾谊对于铸钱的想法。汉文帝五年，汉文帝解除了实行多年的禁令，允许人民自己铸钱。贾谊立即上疏表示反对，他指出，开放铸钱，人民必定会在铜中掺假，而掺假必将受罚，这是“为民设阱”；让人民自己铸钱，必然轻重不等，造成币制混乱；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妨害农业。贾谊在《铸钱》、《铜布》两篇文章中反复谈到这一危害：“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炉炭”。“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这一点，用《汉书·食

货志》关于武帝时赦盗铸钱罪徒上百万的记载来印证，说铸钱妨害了农业生产应该不是危言耸听的。

四、维护中央集权

汉朝前期对中央政权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诸侯王的分裂。汉初刘邦称帝时，那些与他会兵垓下消灭项羽的力量，如韩信、英布、彭越、卢绾、臧荼、张敖、吴芮等，都论功封王。为取得力量平衡，刘邦在逐步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王作为朝廷蕃屏。这种安排，确保了刘氏皇朝经历吕后统治之后而存在下来。但在汉文帝登基之后，同姓王的存在却又对朝廷构成了威胁。贾谊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威胁，并把这种威胁归结为两种弊病：其一是已封的诸侯王血缘关系太疏。“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专大权以逼天子”。贾谊把这种亲疏背谬的现象称之为“蹠戾”（《大都》）。

其二是与文帝血缘关系远的诸侯王权势太大，封土太多，而文帝的亲生儿子们的力量和封土都太少。“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适足以饵大国耳”（《益壤》）。贾谊用人体与四肢来比喻朝廷与诸侯王的力量对比，指出“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无聊也。”贾谊把这种异己力量的过于强大称为“馱”（《大都》）。

那么应该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贾谊提出了三项措施：其一是定礼制，明尊卑。防止诸侯王由礼的僭越而滋生政治妄想，这是借天子之势约制诸侯之心。《等齐》、《服疑》等篇即专论此事。其二是增强亲朝廷的诸侯王的力量，《益壤》篇即专论此事。这是武力制约，是解决燃眉之急的暂时办法，这种有远见的安排，为景帝战胜吴楚七国之乱奠定了基础，但并未能最终解决问题。其三是定地制，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不引起反抗地削

弱瓦解诸侯的力量。(见《蕃强》、《五美》、《制不定》)。这是最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后来由汉武帝以颁布推恩令的方式加以实现，最终解决了汉朝的诸侯王的威胁。而贾谊在论述诸侯王问题的上述思想，以及他提出的分封皇亲的理想标准是：“爱之故使饱梁肉之味，玩金石之声。臣民之众，土地之博，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然而权力不足以侥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这对于其后千余年封建王朝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的。

五、与匈奴单于争其民

匈奴威胁，是汉初主要外患。自汉高祖刘邦败于平城之后，汉朝对匈奴主要奉行和亲政策。到汉文帝执政，由于内有诸侯王威胁，国力不足，仍然对匈奴和亲，而匈奴单于屡次率兵入侵，常有磨擦。贾谊对妥协的和亲政策不满，《解县》、《势卑》、《威不信》、《匈奴》等篇集中反映了这种不满。他站在华夏正统的立场指出：“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人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势卑》）。

该怎么办呢？贾谊提出了一个“战德”的办法，立“三表”、“五饵”，与单于争夺匈奴人民。所谓“三表”，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体现并使匈奴人懂得汉朝天子讲信誉，爱匈奴人的外貌，并喜欢匈奴人的技艺。所谓“五饵”，是指用华丽的衣饰车马和有气派的随从、美味的饮食、音乐歌舞娱乐、富裕堂皇的宫室、皇帝的亲幸宠爱，来引诱匈奴人民前来投奔，达到离间匈奴君臣、孤立单于，最后打败匈奴的目的（见《匈奴》篇）。

在对待匈奴入侵问题上，贾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他提倡的怀柔政策和战德主张，符合当时的形势和持久作战的需要，在文帝、景帝朝对外政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哲学思想

贾谊的哲学思想贯穿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但集中论述的，有《道术》、《六术》、《道德说》等篇。实际上，贾谊哲学的重点，是人君治世的方法，虽然他也谈天、谈道、谈万物的本体，但所有这些最后都落脚到治世，天道万物只是为他治世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而在这些具体理论方面，贾谊受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思想和张苍的直接影响很深。

在贾谊看来，万物的生成，源自永恒的理念即“道”，道是空虚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本体，“道者无形”，“物之所道始谓之道”。道产生了“德”，德具有了实在事物的秉性，它具有具体的秉性和事理，但它不是事物，还不是实有，只是产生实有的母体。“德者，离无而有之”。德产生并滋养万物，是万物的直接来源，但却不是根本来源，根本来源是道，德只是道与万物之间的一座桥梁。

道和德的性质如何呢？贾谊认为道“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道术》）。道是“无”，“无”并不是说它本身不存在，而是说它空阔无边的广大，无所不容。“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县，各得其所”（《道术》）。而道之术，其实只是通过“正己”来实现的。而“德”则有所不同，它有许多实在的东西，“德有六理”，“德有六美”，“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道德说》）。

“道”在贾谊看来是一种理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规律。符合规律的认识，贾谊也就称之为“道”；符合规律的自我修束，也称之为“道”；符合规律的治理，也可称之为“道”。因此“道”在贾谊书中含义虽多，但脉络却是清楚的。

作为使治道符合天道的自觉努力，贾谊依照“道”和“德”的关系，描绘了他理想中君和臣的各自作用。贾谊理想中的人君

合于天道，应该是清静无为，正己而治天下的；而贾谊理想中的臣，则应该是秉承人君的希望来治理国家、改造人民的，是应该具备仁义忠信等优良品德的。在贾谊这里，道家的无为和儒家进取在分工中找到了结合点，与一边强调积极有为入世，一面要求君主“垂拱而天下治”的正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但在贾谊这里，经典的儒家学说中掺入了更多的汉儒特色，鲜明地具有了天人合一的趋向。

除上述六个方面以外，贾谊还论及了许多方面，例如由于长期担任太傅之职，他在《胎教》、《保傅》、《傅职》等篇中就教育问题有很深入系统的论述；由于他对古代典籍非常了解，故就《诗》、《乐》等文艺作品的作用也在多处有所论述。但由于不构成作为政治思想家贾谊思想的主体，这里略而不论。

真伪问题

《新书》的真伪问题是由对其思想内容及艺术价值的评价引发的。本来，由于各人欣赏趣味不同，对同一作家的著作的评价高低不同甚至相背，是很正常的。例如，毛泽东喜欢贾谊的文章，称之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见1958年4月27日给田家英的信）。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也喜欢《新书》，他写道：“余尝读贾谊《新书》，见其经济之道，真命世王佐之才也。”“其心切，其愤深，其词隐而丽，其藻伤而雅”（《文薮》卷三）。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清代文章家汪中也推崇《新书》，他在将《新书》与《汉书·贾谊传》、《食货志》所载《治安策》等作比较之后指出：“班氏约其文而分载之本传、《食货志》尔，其指事类情优游详鬯，或不及本书”（《述学内篇·贾谊新书序》）。但南宋学者陈振孙不喜欢《新书》，在宋代“以心逆志”的怀疑风气之中，他提出：“今书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余皆录《汉书》语，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其非《汉书》所有者，

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直斋书录解题》）。陈氏结论下得很决断，但作为论据的实际只是一点感觉：觉得《新书》中凡是《汉书》未予转载的内容都“浅驳不足观”。于是提出一个假设：今本《新书》不是原书，而是好事者分割《汉书》中所载贾谊文章拼凑而成。宋代大儒朱熹的欣赏趣味接近陈氏，但他提出另一个假说：“此谊平日记录稿草也。其中细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余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稿耳，中间事事有些个”（《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其后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卢文弨《书校本贾谊新书后》，基本承袭朱氏“草稿”说，认为不是伪书，但亦不是成品。

《四库总目提要》没有脱离前人怀疑的窠臼，但却提出几条有力证据证明《新书》有不容置疑的真实内容，其一是《汉书·贾谊传》赞班固的原话：“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班固自己明说是从贾谊五十八篇原书中摘取“切于世事者”收入本传。其二是东汉应劭所作《汉书注》于《过秦论》下注明：“《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可证东汉人所见到的贾谊《新书》首篇排列与今本同。其三是《汉书·贾谊传》赞所称“三表五饵以系单于”的唐人颜师古注所引“三表五饵”的内容与今本《新书·匈奴》篇一致。其四是《史记·孝文本纪》唐司马贞索隐所引《贾谊书》“卫侯朝于周，周行人问其名”等文字也与今本贾谊《新书》相同，可证唐人所见的《贾谊书》与今本相同。《四库提要》本应归结上述证据之后否定陈振孙和朱熹等的怀疑观点，但却作出了一个新的错误的结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

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全面比较《新书》和《汉书·贾谊传》之后，真正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他着重考证班固摘录《新书》并处理不当之处。他指出三处明显不当。其